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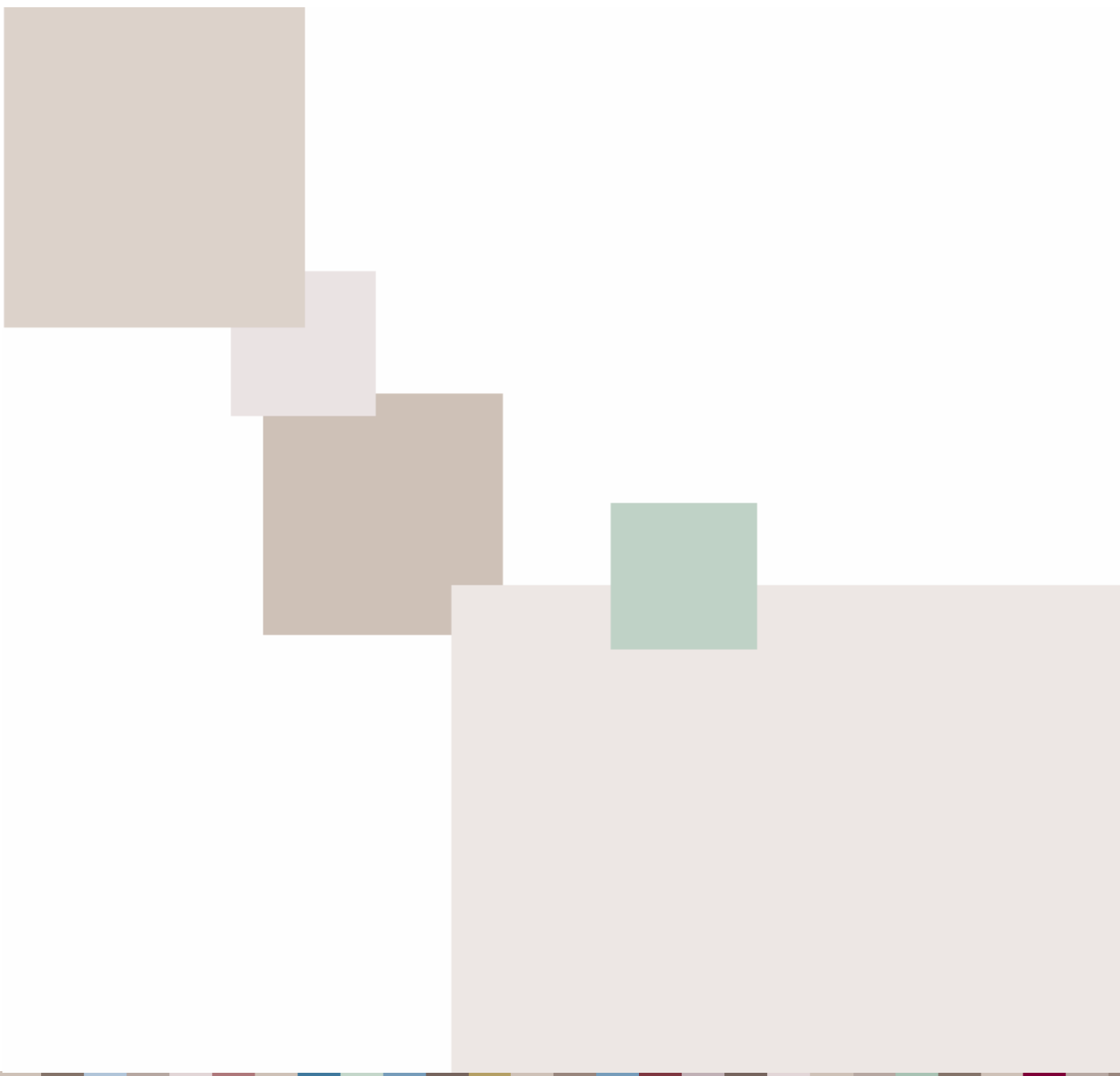
第一编

宏观经济、福利和 性别平等



新经济，新工作：中国辽宁省，一位年轻姑娘身着卡通服装在商场里搞起了促销。

男女平等：在不平等的世界里争取公正



过去二十年来，经济政策反映了加速全球经济一体化（即“全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通常与扩大国际及国内经济自由化相关联。赞成经济自由化的决策机构——比如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往往受到新自由主义和市场本位思想的鼓舞，认为全球市场的扩张与深化以及减少国家干预基本上符合经济效率、增长、甚至是人类福祉，因而是可取的。非正统的经济学家则主张加大国家参与力度，用以规范市场，实现经济增长、结构改革和人类福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以经济高速增长、快速工业化和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为特色的东亚经验强调有必要强化公共政策干预，尤其是产业政策干预。国际金融机构开出的“自由化处方”和东亚地区正在实行的“有序市场”，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对于妇女和性别平等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本编第一章（全书第二章）以“自由化和解除管制：通往性别平等的道路？”为题，首先分析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特征；之后研究全球化纲领的各种内容：贸易和金融自由化；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限制；以及私有化。接下来的一章，“自由化、市场和妇女的收益：一幅混合画面”，评估了这些政策对妇女的主要影响和在性别平等方面进行的探索。第三章（全书第四章）题为“巩固妇女的收益：扩大政策纲领的必要性”，以收入和工资标准以外的多种指标为依据，探讨了妇女的生活境遇。结尾部分探讨了需要如何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纲领才能有助于改善妇女的福利状况和促进性别平等。





第二章

自由化和解除管制：通往性别平等的道路？

过去20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是宏观经济领域，以及国际社会和各国国内理应实现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而不是国家干预和市场管理。现在看来，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令人失望，在尚未建成有效的社会供给和安全网的情况下，自由化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贫困和失业。因此，要求政府采取干预和再分配行动的呼声日益高涨，以缓解社会疾苦，重新调配政策方程式中的平等关系。

在有关国际贸易和金融资本流通、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以及福利服务私有化等其他重要问题的辩论当中，人们很少会注意到性别问题。但主张妇女权利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从性别角度对当前宏观经济趋势和政策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确定了这些趋势和政策对妇女和性别平等问题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本章首先概要阐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各个关键领域，接下来的两章将对这些调研成果进行考察分析。

自由化和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逐渐占据上风，其中心观点是：追求人类福祉的最佳途径是减少国家的作用，释放企业家的能量，以实现经济效率，加速经济增长。一些国家的政

府，特别是由罗纳德·里根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和由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领导的英国政府，欣然自愿接受了这个纲领。但是对于南半球的许多国家来说，这个纲领则是在八十年代初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作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申请更多贷款的先决条件而强加于人的。

债务危机本身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纲领造成的恶果。这场危机起因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应对1973年和1979年石油价格飙升而做出的各项调整决定。出路之一是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优惠融资机制，将石油输出国增加的大量美元收入转移到石油进口国。然而，有很多石油美元是经由新兴的私营国际金融市场实现再循环的，从而给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银行带来了巨大利益。但事实证明，这种国际市场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描绘的竞争市场有着天壤之别。私营银行向主权国政府过量出售贷款，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些美元贷款的债务负担终于在八十年代初演变为一场危机：时任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保罗·沃尔克突然宣布大幅度提高利率，以控制美国的通货膨胀；债务国的沉重贷款负担再加上高额利率，由此便引发了债务危机。¹ 曾不断有批评者指出，石油价格上涨和债务危机是集体问题，需要得到国际公平的解决方案，但是

这些警告被置若罔闻。于是，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为华盛顿通过布雷顿森林机构强行建立一系列新的国际经济政策体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自1994年以来，这些政策体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乌拉圭回合协定》得以加强。

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政策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解除对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劳动力市场应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才能使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在产品需求日新月异的贸易和生产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灵活性。然而，如果以为这是一个不受任何管制的过程，那就错了：丝毫不加管制只能造成一片混乱。²与新自由主义主张形成对照的是，解除市场管制或市场自由化实际上涉及到有利于某个特定国际金融机构所倡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新管制或再管制。这些新形式的管制通常有助于增强私营公司的力量，降低普遍社会利益的相对重要性。

近年来，全球化既包括国际货物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同时还包括国际资本流通（外国直接投资、证券资本投资、银行借贷等）；此外还涉及到一些新的、往往是标准化的管制措施，这显然是为了营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场。实行再管制的领域之一是为奖掖公司利益而设计的，这就是新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世贸组织的有关协定旨在强化制药等领域的公司权利，借以保障跨国制造商的垄断势力，致使救命药品的价格居高不下。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治疗问题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实例。这影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的切身利益，因为当地妇女的艾滋病感染率非常高，这些妇女及其子女的处境特别危险。

货币和财政紧缩被认为是新自由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手段，因而有

助于吸引流动的金融资本。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会抵消金融投资的收益，通胀率过高多半会排斥、而不是吸引金融投资者。预算赤字被视为通货膨胀的导火索，因此，削减公共开支被认为是吸引流动金融资本的重要手段。

各国遵照上述理论，采取了旨在实现对外经济关系自由化的措施，但尚未见到国际劳工流动自由化方面的努力。自由化的支持者们争辩说，贸易体制自由化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专业化，从而达到减少贫困的效果。

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承认，国内竞争的加剧，各国经济体对国际贸易及资本流通敞开大门，或许会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国内外的动荡，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财政和经济不稳定。但他们争辩说，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由此产生的快速增长而得到补偿，因为增长率的提高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取代被破坏的工作岗位，最低限度的社会安全网足以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失。

就妇女状况而言，新自由主义观点——尤其是世界银行所采纳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提倡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纲领，有利于实现性别平等。³依据如下：市场自由化会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女性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是相互关联的；而这种机会的增加有利于实现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所以说，市场自由化本身会促进性别平等。这种论点正确与否，还没有定论；本章和下一章提供的许多事实表明，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有管理的市场”方法

新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化在促进增长、改善福利方面的作用，可是有许多不按照新自由主义指令行事的国家也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发展。这些

“有管理的市场”特例包括几个亚洲国家，特别是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中国，以及在典型程度上稍逊一筹的印度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策略可以用“非正统”来形容：政府展现出从战略上对市场实施干预和管理、以促进发展和增长的意愿。尽管不存在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政策，但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有选择地采取干预措施，规范汇率、金融流通、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以促进国内产业的技术获取和学习过程。⁴

虽然这些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以前就实现了工业化，并且取得了令人艳羡的经济业绩，但现在却有人声称，这些国家的成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的佐证。⁵ 在已经看到成功的发展模式之后再做出这样的解释，忽视了国家干预和市场管理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有关国家利用国家干预促进国内产业“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从而形成强劲的国内增长势头。为此，作为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手段，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战略控制，并将这方面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扩展到国内其他产业，这样就把国家推上了工业发展的上升轨道，但是并没有放弃政府决定工业化过程的能力。大韩民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大韩民国允许跨国企业投资电子产业，但不得进入其他部门。⁶ 当电子产业的国内技术能力得到充分扩张之后，外国直接投资再度受到限制。中国也是如此，现阶段的外国直接投资被限制在政府希望提高能力的目标产业上。

此外，上述很多国家只是在战略上实行贸易自由化，在有些情况下，对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进口施加限制。这样做既节省了外汇资源，也促进了对国内产品的需求。新自由主义者给这

种政策贴上了“保护主义”和“无能”的标签；其实，这往往是有交换条件的：国内企业必须达到出口和投资目标，才能得到补贴和进口保护。⁷ 因此，保护性产业政策并没有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最终成为阻碍结构改革的障碍。这种政策也被用来缓解结构改革造成的冲击；而保护主义使得企业在重组过程中能够保持适当的收入水平。此外，这些政策还可以间接地保障工人的工资，因而同那些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经济体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的结构改革可能伴随着严重的经济混乱和工人的收入损失。

此外，亚洲各经济体不同程度地限制金融自由化。例如，中国继续保持其货币的不可兑换性，保护人民币免于大幅波动，从而避免给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同时继续维持有利于促进出口的汇率。马来西亚也采取了干预措施，最明显、最直接的做法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临时重新启动了资本管制，以保护本国币值，并降低提高利率的必要性。各方普遍认为，这些管制措施协助马来西亚经受住了这场金融危机的考验，并且在危机过后比没有实行管制的国家更快地复苏。⁸

由此可见，这些国家希望采用更加广泛的政策工具，借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为经济波动提供缓冲地带。这些国家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实施战略经济开放，亦即，有利于实现促进工业化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国内目标的有管理的经济开放，同时获取掌握先进技术的手段。因此，很多国家设法培育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生产，从而实现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在这个集团当中，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和新加坡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上述政策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规避了低薪出口生产企业对于有限市场份额的竞争加剧所造成的负面

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登上了更高的工业阶梯，在高端商品市场参与竞争。

以上这些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灵活做法，以实现增长和发展，但是这些国家同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种一体化过程确实是提高国内生产力的一个关键机制。然而，很多国家的外向型发展是由国家战略决定的，而不是全盘自由化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台湾省和大韩民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或是出于自愿，或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其他政治紧张局势的压力所致。例如，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大韩民国采取独立央行的模式，从而限制了利用定向贷款和补贴信贷作为促进工业化和增长的手段的回旋余地。目前，中国正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要求中方调整人民币的币值；中国台湾省则正在采取措施，实现外国直接投资流通的自由化。

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干预手段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从而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强劲增长，但在公平公正的问题上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情。不过，由于再分配被视为促进增长的必要途径，公平有时也会成为各国力争实现的目标。例如在大韩民国，工资准则是提高工人工资的一种手段，否则工人就无法在劳资谈判中要求把工资提高到与生产力增长相适应的水平。有些情况下，工资准则能够激励工人“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智”，从而加快采用引进的新技术和提高生产力。⁹这说明，兼顾增长与公平是可能的，但争取公平的具体条件则依不同的国家、经济结构和历史环境而异。在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男工普遍经历过工资带动增长的情况，即，通过加薪推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由此产生的资金收益用于资助社会开支，从而促进公平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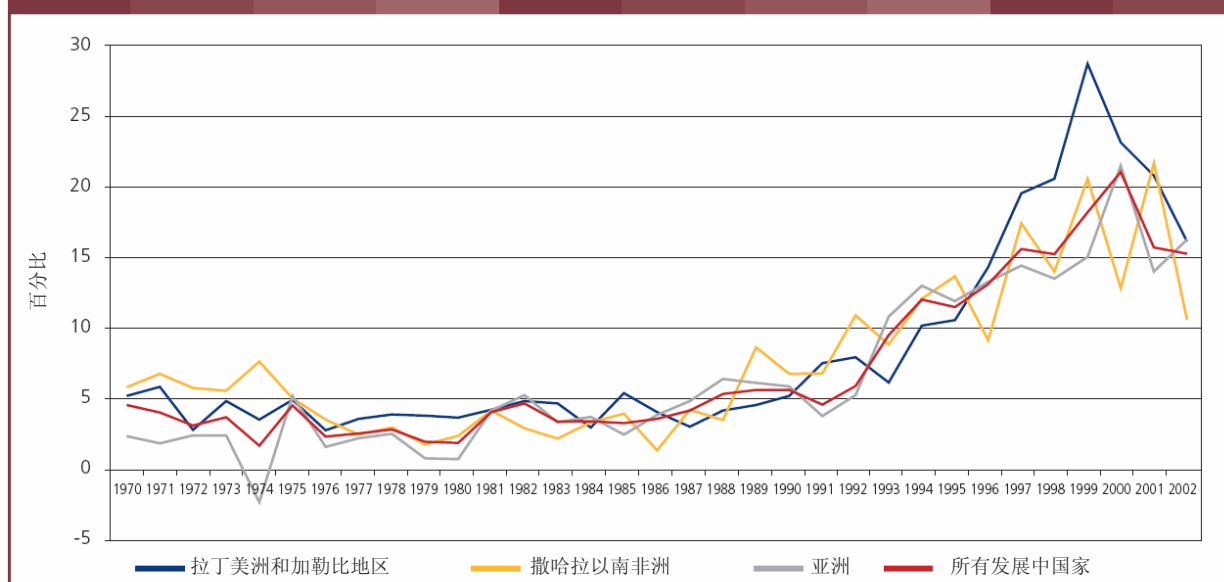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单靠增长本身还不足以缩小收入和福利方面的性别差距。¹⁰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妇女通常被排斥在技术先进产业之外，在工作类别上受到限制，使她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改善就业条件和增加其获得社会供给的机会。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妇女在家庭内部争取改善资源分配和劳动分工。的确，东亚的经验突出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增长可以提高绝对意义上的生活水准，但并不能自动减少不平等现象，特别是性别方面的不平等（参见第三章和第四章）。

全球化的宏观经济效应

近二十年来，推动全球化的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变量发生了一些重要转变。用外国直接投资计量的跨境交易、证券资本流通、以及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的货物及服务贸易，都有所增长，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是大幅度增长。¹¹ 金融流量虽然难以精确估算，但也有惊人的增长。截至1994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比十年前增长了1200%。¹² 外国直接投资也有所增加，虽然这方面的资金大多流向发达经济体，但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也在增加。不过，这些资金相对集中在四个国家——中国、巴西、香港（中国特别行政区）和墨西哥，约占2001年流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60%。¹³

更重要的是，从图2.1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份额，一直在持续增长。该图展示了内向型和外向型外国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总额（即投资）的百分比。这种比率大体上反映了企业流动性（与金融流动性相对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可以表明，在当地条件对企业的利润目标构成挑战的情况下，企业调整布局的能力。正如该图所示，企业重新选

图 2.1 内向型和外向型外国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总额的百分比（1970 至 2002 年）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资料计算。

址的方便程度大大提升了。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交通运输成本降低，这使得将部分、甚至全套生产过程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可行。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金融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国家解除对外国投资的管理法规，更加助长了这一趋势。就其对工人的影响而言，对这些数据的解读方法之一，是用其来衡量公司相对于地方政府、工人和公民的谈判能力的发展趋势。这种计量方法的波动性很大，因为它反映出资本重新调整布局的实际可能性，并且突显了这种重新布局对于工人和政府构成威胁的可信程度。

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的一个明显效果，是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降幅很大（表2.1）。通胀率的降低，可以吸引更多投资，从而有望推动宏观

经济的增长。有观点认为，降低通货膨胀率、调整生产方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以及减少国家作用，可以提高生产率、产量和增长。这些政策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基础。可是，（通过财政和货币紧缩）降低通胀率会对总需求、产量和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可能抵消降低通胀率所产生的效益。

有证据表明，降低通胀率的代价是巨大的，并且已经造成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表 2.2）。除东亚和南亚之外，1981至2000年的增长率普遍低于1961至1980年的增长率。由此可见，自由化的增长效应充其量只能说是令人失望，对于最贫穷的国家则更是如此。增长速度放缓对于各国增加收入和改进福利的能力产生了严重影响。

表 2.1 通货膨胀情况（10 年平均消费价格）

	1986至 1995年	1996至 2005年
发达国家	3.6	1.8
发展中国家	58.0	8.8
非洲国家	27.4	12.2
亚洲发展中国家	11.2	4.0
中东国家	17.7	9.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194.7	9.0

注：本表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所使用的国家地理区域分组方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指的西半球）。

资料来源：IMF 2004。

表 2.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平均年增长率发展趋势（1961 至 2000 年）

	1961至 1980年 (%)	1981至 2000年 (%)	百分点 增减
非洲	1.7	0.3	-1.4
北部非洲	3.3	1.7	-1.6
撒哈拉以南非洲	1.1	-0.4	-1.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3.0	0.6	-2.4
加勒比地区	3.2	2.2	-1.0
中美洲	3.1	0.6	-2.5
南美洲	3.0	0.5	-2.5
亚洲	2.7	4.4	1.7
东亚	3.1	6.1	3.0
东南亚	3.7	2.9	-0.8
南亚	1.7	3.5	1.8
中亚和西亚	2.8	1.1	-1.7
大洋洲	2.0	0.0	-2.0
发达地区	3.2	1.4	-1.8
东欧	10.7	1.7	-9.0
西欧	3.4	1.9	-1.5
其他发达地区	3.4	2.3	-1.1
全世界	2.8	1.9	-0.9

注：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业经人口加权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 Heston 等 2002 计算。

增长速度的放缓限制了就业选择权，这不足为怪。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供不应求，工人缺乏保护和保障的临时工和自营职业的增多就是明证。¹⁴ 此外，搞活劳动力市场的努力甚至使得正规部门的工作都变得越发没有保障。许多发展中国家创纪录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甚至高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欧洲和日本的失业率有增无减。美国也同样如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失业率超过了五、六十年代，而且非自愿的非全日制就业率也提高了。总之，有偿工作岗位依然稀少，而且越来越不稳定。

随着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步的逐步深入，宏观经济不断出现严重问题。金融流通自由化政策使得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金融危机日趋频繁，其严重程度也日甚一日。在作为跨国资本主要接收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问题尤为突出。金融危机使各国普遍丧失了增长率，并且使得国家收入再分配更加不平等。¹⁵

财政收入、税收和公共开支

有证据表明，近年来由于实行贸易自由化和降低关税，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进而造成财政紧缺。例如，从1970年至1998年间，低收入国家的贸易税收占总税收百分比从40%减少到35%。¹⁶ 因此，在1985至1989年以及1995至1998年的贸易改革之后，低收入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的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平均减少了3%。国内解除金融管制、资本市场自由化、复合汇率的逐步废除、以及货币贬值等多种因素，剥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其他财政收入来源。¹⁷ 此外，由于偏重私人投资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致使资本税率降低，各国被迫提高劳动税率来弥补财政损失。¹⁸ 于是，便出现了将资本所有者的纳税负担转嫁给工人的再分配方式。可是，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正规部门就业规模和非正规经济规模都

很小，这些国家不得不实行销售税和增值税，而这两种税收的税率通常是递减的。

由于丧失财政收入来源给政府财政收入造成压力，迫使许多国家的政府减少了政府开支在国内总产值中的份额。有些情况下，削减开支主要集中在资本开支方面，即基础设施，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社会开支（卫生、教育、福利和社会安全网等方面）也受到了影响。¹⁹

人类发展、贫困和收入分配

对于宏观经济的基本发展趋势固然没有太多的争论，但在自由化政策能否改善福利的问题上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由于各方对于福利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辩论更加激烈。新自由主义者往往从收入的角度来定义福利和贫困，依赖对贫困的货币度量作为评估自由化政策的标准。近年来，人们开始思考不平等问题的发展趋势，经济学家正在就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平公正的目标展开一场大辩论。有人认为，平等（特别是教育平等）是实现增长的前提。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平等可以促进政治稳定，减少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功能性失调。由此可见，对平等的重视往往具有功利性，人们看重的是平等对于市场结果的潜在影响。²⁰

注重人权问题、强调人类发展的人建议采用另一种尺度来衡量进展情况。²¹ 这种观点强调，发展的目标不仅仅包括人均收入，还应该考虑到“能力”和“功能”（比如预期寿命和教育），以及权力关系、不平等、人格尊严、表达个性的机会和权力等问题。²² 所有这一切都影响到人类自由和做出有意义的生活抉择的能力。²³

即便以货币作为衡量尺度，全球化政策对于贫困率的影响也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世界银行对于

全球贫困状况的估算以每日 1 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为依据，并按照各国的购买力差异加以调整。²⁴ 采用这种贫困线来计量，在1990至1999年间，全球贫困率从32%下降到25%，贫困人口从13亿减少到11亿。可是，许多学者对这条贫困线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标准会导致全球贫困状况被低估。

人们依据以下几点，对世界银行的数据提出了质疑：将地方货币兑换为美元的方法；对于贫困线的选择；以及中国的情况所造成的统计偏差，中国的扶贫成果抵消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持续贫困或贫困加剧的趋势。²⁵ 此外，世界银行采纳的每日 1 美元的贫困线未能捕捉到发达经济体的贫困趋势。在一些发达国家，收入不足导致了社会排斥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贫困。

人类发展的观点扩大了福利趋势评估所依据的信息范围。强调“能力”和“功能”的证据说明，近20年来的宏观经济趋势所产生的影响是比较成问题的。对比1980至2000年与1960至1980年，婴儿死亡率、识字率、预期寿命和教育等多项社会进步指标均趋于放缓。²⁶ 由此可见，全球化进程与人类发展脚步放缓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即便不是因果联系。

除了衡量基本能力之外，人类发展观点还强调不平等作为福利衡量标准的重要性，因为这将影响到权力关系，进而决定国家对于市场成果的分配以及在家庭内部的分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人们近年来深入剖析了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大量证据表明，各国国内的收入和资源差距持续存在，甚至趋于扩大，就是一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也不例外（表2.3）。现已注意到，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在很多国家普遍存在，这其中包括中国、美国、包括南锥体共同

市场成员国在内的众多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多个东欧国家。²⁷ 这些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其他人类发展目标的进步速度放缓的原因。近来有

关不平等问题发展趋势的大量实际证据表明，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尽管在数据界定和衡量标准上还存在某些争议。²⁸

表 2.3 二十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 73 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发展趋势

	国家				所占份额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转型期国家	总计	世界人口	世界 GDP-PPP
不平等趋于扩大	12国： 澳大利亚 丹麦 芬兰 意大利 日本 荷兰 新西兰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美国	16国： 阿根廷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危地马拉 香港（中国特别行政区） 墨西哥 巴基斯坦 巴拿马 波多黎各 南非 斯里兰卡 中国台湾省 泰国 委内瑞拉	20国：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爱沙尼亚 格鲁吉亚 匈牙利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前南马其顿共和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波兰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塞尔维亚和黑山 斯洛伐克 乌克兰	48	47	71
不平等持续存在	4国：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法国	10国： 孟加拉国 巴西 科特迪瓦 多米尼加共和国 萨尔瓦多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塞内加尔 新加坡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国： 白俄罗斯 斯洛文尼亚	16	29	12
不平等趋于缩小	2国： 德国 挪威	7国： 巴哈马 洪都拉斯 牙买加 大韩民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突尼斯	0	9	4	8

注：样本中的73个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80%，占世界国内总产值—购买力平价（GDP-PPP）的91%。

资料来源：根据 Cornia等2004 中的表2.7和2.8改编。

总之，本章提供的证据突出说明了增长率放缓、企业流动性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和经济波动的加剧。此外，对于人类发展、贫困和不平等指标的思考，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无论就国内生产总值的稳定增长而言，还是就提高卫生、教育和人类安全水准而言，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全球化政策能否推动社会发展？

新自由主义纲领对于人类发展的负面影响同以下几个方面关系密切：国家提供社会安全网和促进人类发展目标的能力受到削弱；流动资本造成国家不稳定和丧失权力；以及缓慢增长给就业造成负面影响。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增长来说可能是不必要的，或者说的不利；制定一套虽然不那么正统、但是却适合本国具体国情的政策，则是切实可行的变通办法，至少不失为促进增长的良策。一些国家依靠非正统政策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在促进人类发展的重要方面——性别平等问题上则成绩平平。经济增长、充足的政府财政收入和限制资本流动，为谋求福利和实现平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它们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样，都不能满足各国的发展需要。

注释

- 1 Loxley, 1997; Elson, 2002。
- 2 Jomo, 2003。
- 3 World Bank, 2001a; Dollar and Gatti 1999。
- 4 Amsden, 1989; Wade, 1990。
- 5 World Bank, 1993a。
- 6 Amsden, 1989。
- 7 Jomo, 2003。
- 8 Stiglitz, 2002。
- 9 Amsden, 1989。
- 10 Hsiung, 1996; Seguino, 1997。
- 11 关于这些趋势有关的资料，可查阅联合国贸发会议历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和《世界投资报告》（UNCTAD 2004）。关于外国直接投资趋势的详细资料，请参阅 Braunstein, 2004。
- 12 Eichengreen and Mussa, 1998。
- 13 Braunstein, 2004; South Centre, 1997; UNCTAD, 2004。
- 14 Heinz and Pollin, 2003; ILO, 2002b。
- 15 Kirkpatrick, 2002; Blecker, 1998; Bhagwati, 2002/3; Singh, 2002。
- 16 Khattri and Rao, 2002。
- 17 Grunberg, 1998。
- 18 ILO, 2004a。
- 19 Khattri, 2003。
- 20 Solimano, 1998; 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4。
- 21 UNDP, 2003; Elson, 2002; Cagatay and Ertürk, 2003。
- 22 “能力”（capabilities）和“功能”（functionings）是由Amartya Sen（1985）率先使用的，现已广为应用。
- 23 Sen, 1999。
- 24 World Bank, 2002; Chen and Ravallion, 2001。
- 25 Reddy and Pogge, 2003; Vandemoortele, 2002。
- 26 Weisbrot et al., 2001。
- 27 Cornia et al., 2003; Khan and Riskin, 1998。
- 28 Milanovic, 2003; Wade, 2001。